

妇女问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汪 洋 王义桅

提 要 妇女观是指社会对妇女的看法,人类的妇女观经历了从“文化人”、“经济人”、“政治人”到普遍人权及可持续发展观的演变;考察妇女问题有三个维度,分别以男人、人和妇女自身作为参照系,并对应于平等、博爱、自由三个层面内涵;从总体上看,妇女问题的症结在于生理基础—分工选择—环境强化综合因素的作用,因而需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社会文明三个层次着手加以解决。妇女问题的实质是社会分工所导致的人类生产异化的结果,解决妇女问题有赖于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与社会总异化的彻底消除,从根本上有赖于社会全面、自由与和谐的发展。

主题词 妇女 男女平等

妇女是男人的一面镜子,男人通过女人来完善自我,这已难于概括出妇女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启示;妇女问题本身已成为社会的一面镜子。从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形成到全球问题推动的生态—女性价值观的塑造,从权利平等的追求到权力共享的争取,从站在男人对立面的妇女自我追求到作为普遍的社会公正、合理与和谐发展的共同奋斗,妇女问题不仅在启示着妇女自身,也启示着男人,促使人类自省。

本质上,妇女问题是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形式之一;对妇女问题的考察也是对人类社会本身的考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由全球问题引发的对妇女问题的反思,既促使人们对妇女问题的历史进行新的思考,对妇女问题日新月异的现实作出理性分析,也推动着人们对妇女问题的未来作出全新的展望……因而妇女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历史—现实—未来之内涵与启示。

一、人类对妇女问题的认识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父权制时代以后,女性作为受压迫者的形象日渐深化与复杂化,不断激起人类的同情意识。人们认识到两性在家庭及社会中的广泛不平等,于是在启蒙时代就开始主张通过仁爱与立法来维护和保障女性权益。这种从社会伦理、道德与正义角度出发强调妇女的“文化

人”价值层面,便是人类对妇女问题认识的人道主义阶段。事实上,人道主义情结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认识妇女问题占根本性地位的因素。其次,随着妇女从俘虏、女奴、女佣到社会生产者与劳动者的角色转变,工业革命以后,妇女作为商品、资源与劳动力的存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到,妇女的劳动条件与社会福利也越来越为社会所重视,人们对妇女的“经济人”价值层面的认识日益丰富和深入。然而,“经济人”意识长期局限于妇女对社会生产的显性贡献上。随着近代民主、人权观念的发展加之妇女运动的推动,人们又越来越意识到女性在政治参与、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中的力量与价值,妇女的“政治人”价值得以显现。至此,人们对妇女问题的认识仍囿于两性“不平等”意识内,试图通过增进男女在社会权利乃至政治权力等领域的平等地位来改变这一状况,还未能完全揭示出妇女问题的本质与特殊性,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上妇女权利被最终确定为人权,标志着女性作为“人”的独立性和绝对性,作为人应有的潜能、价值与尊严获得了普遍的理解与承认。

* 本文写作得到了复旦大学妇女研究中心马笑冬副教授的热情指导,谨表谢意。——作者

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和联合国1995年《世界妇女报告》分别指出,“妇女参与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妇女的贡献以及妇女的权利已成为社会和经济变革的中心”。这标志着妇女从历史客体、中性力量上升为历史主体这一人类认识上的飞跃,这就是妇女问题认识的可持续发展观。由此,妇女问题的内涵从男女平等问题深入到关系人类发展的全新领域;妇女自身也从孤立的个体上升为世界性主体力量。这种认识的背景便是全球问题的日益严重及其所导致的人类对自身的主体性行为准则普遍反思与深刻自省的结果。世界妇女意识的形成、国际妇女运动与妇女组织的蓬勃发展、世界妇女会议和有关妇女发展的国际会议(如人口会议)的相继召开,便是这种时代背景的标志与体现。

但是,人类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总是在不断地片面化和不断地扬弃着片面化。从哲学、道义角度认识男女平等的抽象、虚幻与笼统性,到法理角度认识男女平等的滞后、简单与绝对性,以及从政治与制度角度认识男女平等的虚伪与形式性,乃至从社会经济学角度——不论是把女性作为社会发展的资源还是主体,甚至是关键性力量——都无法掩饰其背后的巨大功利性与应急性。

以女权主义思想指导的妇女运动,企图超越社会、政治观之局限,从社会存在本身去把握妇女问题自在的本质内涵。但是,从历史经验看,妇女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代表性不强,妇女代表与群众间的授权与承诺关系不明显或干脆没有,运动本身沾染了很强的政治工具化、金钱化与学术化气息,其主张和行为往往比较激进。因此,激进的妇女运动事实上导致了对妇女问题认识的分歧,并未更好地完成这一使命;人们对妇女问题的认识仍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全球问题本质的日益暴露而不断深化其实质性内涵。

二、妇女问题的现实表现

考察妇女问题有三个维度,分别以男人、人和妇女自身作为参照系。以男人为参照系(即拿女人与男人比较)的妇女问题集中表现在“不平等”一词上,男女不平等长期以来成为妇女问题的基本表现层面,然而它绝不是妇女解放的全部内涵,只是妇女问题的初级形式与自然反应,对应了社会

发展的广泛不平等状况以及对平等的追求阶段。由此,作为妇女问题现实表现的第一层内涵便是男女不平等;而人们对男女不平等内涵的认识又经历了从权利不平等到权力不平等的演进。

权利的不平等表现在社会(包括家庭)、经济、文化三个领域。反对男女权利不平等的斗争从家庭—社会角度讲有从反对家庭暴力的被动诉求到争取家庭与社会发言权的主动要求,从追求公正的社会福利与保健权利到争取性权利的自由等。妇女在家庭—社会舞台上较之于男人所享有的不平等权利,一直是各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恒常性问题。经济与文化层面的男女不平等是妇女问题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化,这仅在妇女走出家门,享有工作与教育权利时才得以显现。它是传统的两性社会分工淡化,妇女初步摆脱家庭角色束缚而日益具有相应的社会角色的产物与表现,因而只是到了近代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所推动形成的社会大分工的出现才为其提供了相应的社会基础。“从世界的经验来看,19世纪的工业革命把生产力功能从家庭中剥离出来,妇女的劳动从私人领域进入了公共领域。从此性别的不平等从隐性、个人性走向了显性、社会性。”

男女不平等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十分丰富,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和深化。从就业、劳动条件、同工不同酬到晋升歧视、贫困化和获得金融信贷等经济发展条件方面不一而足。“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确立,即是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妇女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等而举行的大罢工的产物。在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还设有妇女发展银行以特别解决妇女经济发展条件等问题。

文化上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和对妇女的歧视就更为复杂了,“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观念与心理深深地扎根于社会之中,形成所谓“男性化社会”的现实;在教育权上,落后地区“女子无才更是德”的观念仍在作祟;在宗教信仰上,妇女历经千百年斗争至今仍未完全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信仰

——
 笑冬:“一个基本的看法:妇女与农村工业化”,《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5期。

参见拙文:“南亚妇女参政模式探析”,《当代亚太》,1997年第2期。

权利;用文字记载的历史甚至表明,整个社会架构、制度与价值观念都是男性化的历史产物!

追求男女权利上的平等基本上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产物和“天赋人权”理念的必然逻辑,带有极强的理想化色彩。然而现实生活中,权利常常为权力所侵蚀并受其制约,因此在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下,追求两性间权利的平等逐渐发展到追求权力的平等上。

妇女在权力上的不平等集中表现于政治领域,因而妇女追求权力平等的斗争首先由争取妇女参政权揭开序幕,从追求政治权利的平等着手。从1893年新西兰妇女率先获得选举权到现在,除巴林、科威特等少数几个国家外,所有国家的妇女都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男女在政治权利上的不平等在形式上基本不复存在,各国政策法规上男女不平等现象也基本得以消除,而且女性因素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强调,但其实质仍然不容乐观。至于政治权力方面就更不必说了:在政治代表权的设置、利益表达的环节上,尤其是管理决策的政治运作过程中,妇女的影响和真正起到的作用至今仍相当有限,妇女的权益与愿望并不能通过现行的政治权力结构得到充分而有效的表达。

种种现实困境促使人们去思考两性关系中“平等”本身的内涵。

“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基本上可以归入三大范畴:阶级的、种族的和性别的。它们概括了人类社会最主要的、延续最长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之所以能够延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可以被用来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三种不平等中又以性别不平等最晚被提上历史议程。这就表明,人类并非一开始就认识到男女是应当平等的,妇女也一直未奢望过拥有与男子平等地位的未来。在不平等成为恒常事实与深层理念时,产生消除两性不平等的认识与要求是破天荒的进步。如上文所述,提出男女平等的口号是近代启蒙理性的巨大历史贡献:全面痛斥男女不平等现象,要求建立男女平等的社会,则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妇女运动的振奋人心的口号与奋斗目标,男女平等于是成为一种理念。其后,人们更从发生学角度去探究男女不平等的历史根源与演变历程。

人们通常讲的男女不平等主要是就事实状况

而言,是一种结果上的不平等。男女不平等虽一直在缩小,然而新的不平等又在不断出现,男女平等似乎只是天边美丽的彩虹。人们逐渐在思考:男女之间有可能平等么?如果可能的话,如何去实现这种平等?

考虑到两性间在生理和心理上的事实差异,基于人类漫长的男女不平等历史和由表及里严重不平等的现实,产生这些疑问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两性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差异,又有应该平等的理念要求,于是人们认识到平等的内涵有“应然原则”与“差异性原则”之分,亦即男女在理念上的完全平等和实际中的男女有别并行不悖,因而从追求抽象的两性平等层面发展为男女共塑差异性平等的现实范畴,妇女追求的是属于自己的和自己能接受的平等。妇女运动的分化(将“平等”理解为处处、时时要妇女与男子完全等同),女性原教旨主义的不恰当地、过分地追求女性权益(号召女性去超越男性)的教训,为此提供了历史与逻辑的支持。妇女们于是质问着自己:“需要平等吗?”这是怎样的一种平等啊!”

而且,对男女平等的既往追求多侧重于两性在权利上的平等,忽视了权利天然与义务相对称的事实,也就是取其权利平等,舍弃、无视义务的平等;而事实恰恰证明追求综合权利与义务平等的过程往往导致女性的男性化,产生不平等的异化,这也是发达国家妇女运动的沉痛教训之一。于是她们从追求单纯的、抽象的、可望不可及的结果平等,发展到力争社会参与的过程平等,也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追求与男性同等的参与权,真正朝向男女平等的目标而努力,对男女平等的追求更加现实而理性了。

这样,人们在平等源泉的认识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平等不再是上帝的赋予(天赋人权),也不仅仅是男性的让渡(“平等”的结果分配),并且不再是单纯的女性的争取,而是社会进步的自然进程——男女共同努力并分享人类平等的种子与和平的阳光。至于社会的进步,下文将表明,它既

参见拙文:“世界妇女参政: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观察》,1997年第2期。

笑冬:“一个基本的看法,妇女与农村工业化”,《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5期。

需要体制的驱动,更寄希望于文化的创新。

尽管“平等”一词已触及妇女问题的症结,但它远不是妇女问题的本质内涵。男女不平等的更深层面在于是否真正把女人作为“人”和作为类存在物的“女人”来看待,这就引出了以“人”和“女人”为参照系的妇女问题的第二、三层次理念。

淡化两性差异,追求抽象、全面的人类发展的是人类的“博爱”思想,它曾以被动的形式(“神”的层面)存在于各种宗教教旨中,以主动的姿态(“人”的层面)滥觞于法国大革命,并成熟于上文提及的女权与人权的同一和现代女性观的确立之中。

“博爱”层面妇女问题表现的实质,在于它揭示了以两性关系失衡发展为表征的人与人的关系,乃至由此推广形成的人—社会—自然系统的畸形发展,这也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而使人认识到这种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外延至人、自然与社会间的平等以及树立普遍、整体、和谐观念,便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核心理念。

从人—社会关系角度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立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男人与女人间的对立;而从社会—自然关系上说,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相当程度上源于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女人被视为男人的占有物,这是私有观念与男性中心主义的逻辑推广与延伸。正是由于男性中心主义及其泛化和表现出的人类中心主义,才导致了社会生产忽视代际均衡与代内平等的非持续发展的恶果。

从“平等”到“博爱”,妇女问题已从视女性为弱者,从其对立面——男人,从外表来审视妇女问题上升至剖析社会自身,这是历史的进步与必然;这种趋势到了妇女问题表现的“自由”层面就更为深入了。人们开始通过透析女性自身来揭示妇女问题的类本质属性。这就是妇女问题表现的第三个层面。

“自由”层面妇女问题的表现是以女人自身为参照系的妇女通过自我反思所认识到的,也就是妇女追求自身的全面、自由与和谐发展的障碍。对其认识发轫于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并为现代激进女权主义运动所扭曲——将妇女视为一“特殊物种”,其结果是脱离社会自身来抽象谈论妇女问题,造成妇女问题的“异化”。

这一层面妇女问题表现的实质是,它表明现

代文明建立在女性权益被剥夺的基础上,是忽视女性力量、价值与原则的结果,全球问题的产生与激化在相当程度上即源于此。因此,女性力量、因素与原则的发掘、显现与倡导,妇女自身的发展、两性和平、平等、协调关系的真正确立,是推动人—社会—自然系统和谐、有序、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全球问题解决的必然要求与希望所在。

体现在现实层面,妇女运动与和平运动、环保运动等新生社会相互呼应并相互促进,推动着社会变革和国际秩序的重建。“和平、平等、非暴力”是妇女运动、和平运动和环保运动的共同准则,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理想,从根本上预示了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同一性。

这样,人们对妇女问题现实表现的剖析表明,妇女问题“根源于人类解放自身的运动,是这个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极为广阔的领域和方面,不能孤立、抽象地看作是妇女自身的问题”。妇女问题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它集中展示了以两性关系失调形式表现出的人类社会的失衡式发展,还在于它深刻地揭示出人—社会—自然关系中对妇女这一半主体力量存在的忽视,更在于其中对女性价值、女性作用与影响的抑制。

三、妇女问题的症结与趋向

对妇女问题的思考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是对人类历史的探求,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和对社会未来发展道路与发展目标的选择。其第一个层次便是认识到妇女问题的存在。

妇女问题并非一开始就成为“问题”的。原始社会初期,在采集制生产方式和群婚制情况下,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还曾处于支配地位。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血缘关系的演化,人类社会逐渐由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时代,才最终使她们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同时,随着生产关系的演变,社会政治体制也从原始民主制转向寡头专制,政治的斗争性内涵日益显现,社会管理职能逐渐退居次要

曹南燕:“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哲学研究》,1996年第5期。

参见拙文:“全球化进程中的妇女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5期。

地位;而战争和男子对武器的垄断更使得女性成为社会变革的被动承受者,导致“男尊女卑”等级制的强化。

然而,人类认识到妇女问题的存在却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历史上人们虽早已产生妇女地位卑微的意识,但并不具备妇女问题早已存在的明确认识,甚至认为“男尊女卑”是理所当然的、上天注定的。妇女问题成其为“问题”,只是在近代启蒙思想激励下,妇女社会权利问题被全面提出后才最终形成的。自此,妇女问题从家庭走向社会,从意识发展为思潮。

到了解决妇女权利问题的出路——以赋予妇女社会权力为标志的现代妇女运动的出现,妇女问题才产生了历史性飞跃,其肇始便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全球化及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化发展。由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奠定的物质基础,近代启蒙思想运动、社会主义思潮提供的思想基础和工人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形成的社会基础,最终推动了妇女问题的国际化进程。1975年联合国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召开,是年被定为“国际妇女年”,标志着妇女正式登上了世界舞台,妇女问题已为世界所瞩目。

尤其是全球化发展至今,妇女问题已从一国内部的社会问题演变为全球性的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这是妇女问题表现的时代发展内涵。

妇女问题的日趋严重与日益复杂,不断促使人们去思考它产生的历史渊源,而这往往以妇女地位的历史考察形式表现出来。对此,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强调了生产方式及血缘家庭制演变是产生妇女问题的根源,从阶级属性上寻求产生妇女问题的根本社会原因;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则从社会结构与妇女元素组成的角度,通过社会范式的分析来关注妇女的社会属性;文化人类学则追根溯源,认为妇女问题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产物,强调妇女的自然属性;而宗教神学观点,更从发生学角度一劳永逸地阐述了产生妇女问题的终结性根源,着眼于妇女的超自然属性。

不管是作为主流的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激进的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或存在主义的女权主义,还是屈居支流的生态女权主义、女权神学、女权国际关

系学等等,都代表了女性的自省与人类思维方式的演进,同时也是社会矛盾不断深化的产物。

概括起来,妇女问题的症结不外乎是生理基础—分工选择—环境强化这些因素的产品。从生理基础上看,女性相对于男性的生理差别与心理特质是产生妇女问题的随机性前提:“现代科学认为,男女在能力、智力上各有所长,也没有专属的性格和气质,只是不同气质不均衡地分布在两性之间。”

而分工的选择则是产生妇女问题的必然性因素:由自然分工形成的家庭角色和由社会分工形成的社会角色间的二元张力是妇女区别于男性的根本表现之一。

在生理与分工基础上形成的妇女问题,又经环境的强化,于是日益“合法化”,成为社会的“共识”。这种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人文环境。前者又涵盖生存环境与以地理环境形式表现出的文明形态。“岛国效应”(岛国的妇女地位一般较高,因为岛国传统经济以渔业为主,男子外出打鱼,妇女操持家务并料理社会事务,在某种程度上类似母系氏族特征)即是自然生存环境影响妇女地位,从而与妇女问题相关联的典型例证;内陆文明国度一般比海洋文明国度的妇女地位更低,因为前者传统上以小农经济为主,文化上更为专制和保守,这是文明形态影响妇女地位的一个极好例证。

社会人文环境对妇女问题的强化就更明显了。一定的社会体制为妇女问题提供相应的工具合理性;而特定的社会文化则为妇女问题塑造着相应的价值合理性。在封建专制的国家,妇女问题根深蒂固、错综复杂,明显比现代民主政体的妇女地位更为低下,便是不争的事实。

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为妇女解放提供了先进的社会体制,但同时也面临着传统文化的严重束缚,因而其妇女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或解决得更好。

从解决前景层面来审视妇女问题,既令人神往,又使人忧伤。因为这必须解开妇女问题的历史

参见[美]马文·哈里斯:《文化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38、40页。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妇女地位”词条。

—现实—未来的矛盾之结。弥补历史是艰巨的,超越现实更为沉重,拓展未来又是那么令人兴奋。与妇女问题症结的生理—分工—环境三维度相对应,解决妇女问题相应地就需要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社会文明三个层次着手。首先,生产力高度发达才能超越社会(自然)分工与生理差异;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最终将使妇女超越家庭与社会的双重角色冲突;同时,也只有社会的全面进步方能协调好妇女问题的社会张力与社会亲和力的关系。因此,妇女问题解决的前景根本有赖于社会全面、自由与和谐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妇女的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妇女地位的提高,两性关系的改善与和谐发展,又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与前提,两者的互动关系表明了妇女问题的深刻社会背景与实质性内涵。

历史地看,妇女问题既然是社会分工和家庭血缘关系演变的产物,是人类社会非均衡发展的结果与表现,两性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归根结底根源于资本与所有制的力量,以及社会所有制在家庭的继续——家庭产权。传统男性化

生产方式强调的是生产而不是消费,是有报酬的劳动而不是家务劳动,是资本的力量而不是人的力量,这就是社会生产方式产生妇女问题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妇女问题源于人类的私有化生产方式所形成的对自然、对弱者(女性)权益的无偿侵占与掠夺。因此,女性化失却、女性异化本身不过是人类社会总异化的一部分;妇女问题的实质是社会分工所导致的人类生产异化的结果,其解决希望与标志都在于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与社会总异化的彻底消除。

(本文作者:汪洋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学博士;
王义桅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博士生 200437)

(本栏目责任编辑:赖升禄)

Karvonen, Lauri and Selle, Per eds 1995, *Women in Nordic Politics: Closing the Gap*, Suffolk: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71页。

女性心理学家玛丽亚·罗特

女性心理学家玛丽亚·罗特于1955年生于菲律宾的马尼拉,后来由于菲律宾移民限额问题前往美国洛杉矶。她是由两个哥哥抚养长大的。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她发现了许多由于跨文化、跨阶级和跨种族的背景所产生的差异。这激起了她的兴趣,希望发掘这种差异的原因和解决途径。

玛丽亚在1977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并获得心理学和社会学双学士学位。这就为她的研究将个人发展置于集体过程和历史背景奠定了基础。后来她又进入华盛顿大学攻读临床心理学,并于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

玛丽亚的研究工作一直都注重种族身份的动态性质以及种族和阶级借以影响身份发展的历史特质。玛丽亚正是由此出名,并且这也是她离开华盛顿大学后的研究重心。她已经就差异和身份的主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专著。1995年,玛丽亚成为华盛顿大学美国种族研究系的副教授。最近,她又由于对心理学的贡献而获得了公众利益心理学发展委员会(Board of Advancement of Psychology in the Public Interest)的嘉奖。

(凡摘自 <http://teach.psy.uga.edu/>)